

旅印学者周祥光的学术交往与历程*

朱 璇

摘 要：学者周祥光旅居印度二十年，历经求学、出仕、执教、著述，一生致力于中印学术与文化交流，与太虚、张君劢、甘地、尼赫鲁、拉达克里希南、斯瓦难陀等中印贤达交好。他在印度期间，出版中英文著作20余部，极大拓宽了印人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与佛教的了解，也将印度历史与哲学述介到中国。他视学研与实修并重的方法论为中印共有的为学、求真之道，对会通中印学术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周祥光 印度 中印学术

中印友好人士、学者周祥光（约1919—1963）旅居印度二十载（1943—1963），历经求学、执教、著述、出仕、禅修，直至生命终点。他的学术历程和著述，鲜为国人所知。其现有的两种生平简介分别来自释东初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第二十一章“近代学人与佛学思想”第九节“周祥光与佛学思想”^①以及《现代佛学大系》（第23辑）收录周祥光译作不足百字的简介^②，但都篇幅简短，不乏纰漏。^③本文依据周祥光早年在《读书通讯》《觉群周报》《校友通讯》《海潮音》等民国期刊和印度《喜之编》（*Ānanda Vāriā*）刊物上发表的80余篇文章，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学院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1937—1962）”（21YJCZH04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国家民委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释文仅千字，主要对周祥光民族文化书院求学作介绍，并述作者与周祥光书信交往一二事。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http://dongchu.dila.edu.tw/html/02/cwdc_011/cwdc_0110600.html#d1e2659。

② 周祥光述译：《阿育王及其石训》，“现代佛学大系”第23册，台北：弥勒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③ 释著中对周祥光籍贯、民族文化书院建成时间、赴印前期留学时间和经历等都有明显错误。

以及他在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出版的20余部著作，尝试勾勒、还原周祥光旅印前后的研修与学术交往经历，并做简要述评。

一、求索精进：旅印学术历程

周祥光，浙江黄岩人^①，生年不详，有说他与五四运动同年，于1932年毕业于黄岩县立初级中学^②，暂未确证。他曾于1936年前后供职于湖北蕲春行政督察公署。^③

1940年10月，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在云南大理洱海之傍创立，分经子学、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四系。时陈布雷任理事长，张君勱任院长兼训导主任，龚云白任总务主任，张仲友任教务主任。史学系开设与印度有关课程为“东亚邻国史”，讲述印度、安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南洋开拓史。书院拟设南亚洲人类学博物馆，考察西起阿拉伯、波斯、印度，北自蒙古及中国西藏，南至缅甸、暹罗、安南及南洋各岛的繁殖源流、生活状态、语言文字、政治组织等；并计划佛藏英译工作，先将藏文佛经译为中文，再译为英文等传播。^④

周祥光在建院之初入读民族文化书院社会科学系，罗文幹^⑤时任系主任，另有罗努生、潘光旦等学者。由于入读学友皆已大学毕业，上课采用研讨式教学方式，由“系主任与学友共同商定一读书计划，再根据此计划，而有每月之月程及每日之日程，每月呈缴读书札记二篇，但如得指导教授之许可，亦可并为一次，其所作札记，先由教授批阅，再交教务处登记成绩，然后发还。每星期一二两日，为学术讲演，由各教授轮流担任。其他研究时间，院中规定每日六小时，上午八点半至十一时半，下午二时至五时，再次规定时间内，各同学须按时到各

① 参见周祥光《我对修道集团之意见》，《扬善半月刊》1937年第4卷第17期，第3—4页。

② 此说法来自“黄岩在线—佛学家周祥光”，<http://www.05760576.com/2011/04/14/1431302737.html>。

③ 周祥光：《公民教育概论》，《内政研究月报》1936年第5/6期，第69—73页。

④ 详见周祥光《民族文化书院动态》，《读书通讯》1941年第17期，第15页。

⑤ 先后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

系研究室，从事研究”^①。其间，周祥光应时局所需，翻译《德国间谍实录》之系列文章^②和《恐怖的德意志秘密国家警察》^③等文，同时发表《中华精神警察学术之哲学基础》，指出“中华精神警察学术之哲学基础，自必以儒学为依归，凡道为学则，实为彰彰明甚。况警察之本务，为明伦察物，彰往知来，别是非，辨义利，正人心，厚风俗，使民智开……夫警察学术，具体（诚）、相（仁）、用（行）三者，以为基础，方可成为整个完善之学术一统，最高之行政指导原则”^④，此文初步反映周祥光儒学功底。

周祥光就读期间，对佛学产生兴趣，与周通旦、萧中旦、姚积光、苏莹辉一道，跟随精研华严的龚云白教授研习佛学，并请教当时在昆明的太虚法师。周祥光在后撰《我与虚大师最后一次晤面》^⑤和《太虚：他的生平与教义》^⑥记述这段情谊，并在英文著作《中国禅宗发展史》中感谢太虚与龚云白对自己早年学佛的训练^⑦。

民族文化书院环境优美，周祥光在《战时产生的民族文化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动态》两文中盛赞院内美景：“书院背倚苍山，面临洱海，门口老松数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绿叶参天。”^⑧后至印度国际大学，仍忆及书院种种：“环境之清幽，宜于学子求业之所，吾辈居此，尝闻诗圣太哥尔在生之日，每日必召若干学生前来，兴与谈诗论字，或舞或歌，对于学生犯校规者，则必严厉斥之，教之如严父，

① 周祥光：《战时产生的民族文化书院》，《民意周刊》1941年第14卷第167期，第10页。

② 周祥光：《德国间谍实录——马奇诺防线》《德国间谍实录——德国间谍教育》《德国间谍实录——反间谍》，《警声月刊》1941年第6卷第3、5、7期，第29—47页、36—48页、39—48页。

③ 周祥光：《恐怖的德意志秘密国家警察》，《警声月刊》1942年第6卷第1期，第37—51页。

④ 周祥光：《中华精神警察学术之哲学基础》，《警声月刊》1941年第6卷第8期，第35、39页。

⑤ 周祥光：《我与虚大师最后一次晤面》，《海潮音》1957年第38卷第3期，第52页。

⑥ Chou Hsiang-kuang, *T'ai Hsu: His life and Teachings* (Allahabad: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1957).

⑦ Chou Hsiang-kuang, *Dhyana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Teaching* (Allahabad: 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by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1960), p.v.

⑧ 周祥光：《民族文化书院动态》，《读书通讯》1941年第17期，第15页。

爱之如慈母，相亲相爱之情，使余忆起昔日求学于民族文化书院之时，君劭院长之教育学生亦复如是。书院因时局之关系而暂时停办，国际大学依然健在，不禁感慨系之。”^①

1942年夏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停办，周祥光离滇返渝，在周惺甫关照下，在中华民国内政部礼俗司担任一级主任科员，负责房捐、典当及救灾事宜。工作期间，他除继续应稿约翻译《英国政府的体系》^②及《英国政府之体系》（续）^③两篇长文，全面介绍英国政治、政党与政府组织以外，还撰写《中国户口行政》一书，他尊孙中山所旨“人口清查，户籍审定，皆系自治最先之务”，视“户口行政之于建国大业，有若轮之于车，羽之于鸟，不可或缺者也”^④，遂“沉思谛观”，写就民国首部户政著作。

1942年冬，周祥光由重庆赴印，就学于诗圣泰戈尔于1921年在寂乡（Santiniketan）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国际大学是当时印度学术重镇，法国东方学大家列维博士（Sylvain Lévi）主持创立典礼，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兼中东远东研究所所长杜琦博士（Giuseppe Tucci）、罗马大学梵文教授方弥基博士、捷克东方学家温特尼兹教授（Moriz Winternitz）等皆受邀讲学。国际大学中印研究院（Institute of Sino-India Studies）由谭云山主持，开设中文、藏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孟加拉文等语文课，另有中印藏佛教、中印两国其他宗教、中印哲学、中印历史、中印文学、中印两国古代及现代文化之研究。^⑤周祥光在《印度国际大学素描》一文中介绍国际大学的建校史、学校环境、内部组织、生活动态和前途展望，并在末尾不无惆怅地念及中印当时情形，相比留学日本英美数万计，赴印留学者寥寥，其中通印度文者竟无一人。他写道：“吾人如欲亲印，知印，必须

① 周祥光：《印度国际大学素描》，《读书通讯》1943年第74期，第14页。

② 周祥光：《英国政府的体系》，《中央警官学校校刊》1942年第5卷第3期，第208—216页。

③ 周祥光：《英国政府之体系》（续），《中央警官学校校刊》1942年第4期，第159—174页。

④ 周祥光：《中国户口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5页。

⑤ 参见周祥光《印度国际大学素描》，《读书通讯》1943年第74期，第14页。

至印度，切实研究，实地考察，能全般通晓印度情形，则将来中印两国，方有联合之可能，否则，言而不作，于事无补。”^①

在国际大学一年多后，周祥光于1944年入读加尔各答大学。^②彼时加尔各答大学不仅是印度最早设立之大学，也是“亚洲近代最大之大学，亦为剑桥牛津在印之分校，因为牛津剑桥是承认加大之学位的”^③。大学由八十余所学院组成，除加尔各答城以外，其他地区设有分院。周祥光初入苏格兰国教学院，按当时学制要求，每一学生主修英文之余，还需选修一门他国语言或近代印度语言，周祥光修读英文、印文、经典文学（包括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经济、哲学等课程。他后入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继续修读政治经济与政治哲学系课程。在加尔各答大学期间，他撰文《印度教育近况》和《加尔各答大学与印度近代高等教育》，介绍加尔各答大学与学院建制、课程、学位及申请制等。

1944年，民国政府在加尔各答设立外交协会印度分会，由保君建担任理事长，周祥光任分会主任和秘书长。他与印度学者合作将孙中山著《三民主义》翻译成孟加拉文^④，又请印度国民大会党议会领袖、国民大会党孟加拉省主席、著名律师沙拉特·昌德·鲍斯（Sarat Chand Bose）为之作序。这位鲍斯是大名鼎鼎印度国民军指挥官、国大党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之兄。周祥光评价沙拉特·昌德·鲍斯道：“他是顶希望中国民主团结的一人，与尼赫鲁先生热望中国统一一样。”^⑤同时，周祥光主编每期数万字的国民外交周刊，直至1945年12月辞去主编之职。^⑥

① 周祥光：《印度国际大学素描》，《读书通讯》1943年第74期，第16页。

② 参见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19卷第7期，第5—8页。

③ 周祥光：《加尔各答大学与印度近代高等教育》，《学生杂志》1945年第22卷第4期，第57页。

④ 此著后译为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但出版情况未知。参见《三民主义印译本》，《扫荡报（重庆）》1944年8月20日，第0003版。

⑤ 周祥光：《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旁听记》，《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30日，第0005版。

⑥ 参见“甘地曾患痢疾，同情印度英人请释放政治犯，国民外交协会印分会慰劳盟军”，《西京日报》1944年4月17日，第2版。

1945年，周祥光任《中央日报（重庆）》驻加尔各答特约通讯员，曾短暂负责加尔各答中华学校校务，任校长一职。在此期间，他因敬慕圣哲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及拉摩禅师（Sri Raman），专程前去拜谒。

1946年，尼赫鲁组建印度临时国民政府，周祥光受推荐，出任印度政府内政部出版司中国科科长。他于9月2日从加尔各答出发至首都德里就职，担任供中国人研究印度文化之需的《新印度季刊》（中英文对照）和供亚洲人探究世界近情之需的《世界月刊》（中英俄文对照）主编，并负责对华文化联络事宜。^①他在写给太虚法师信中言：“该两刊专载有关印度文史艺哲科学文章，俾吾国人民，明了印度实况，进而联系中印两国情谊于不替也。”^②

周祥光在印临时政府任职期间，也任《申报》特别联络员。他翻译尼赫鲁撰《中国与印度》并载于《申报》^③，翻译尼赫鲁著《尼赫鲁给女儿的信》出版^④。他的多重身份为他近距离参与印度时政提供便利，留下不少观察印度时局的佳作，如《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旁听记》《印度政府改组经过》《分娩中的印回现势》《印回分治 印度政局在演进中》等。^⑤

1950年德里大学因获捐赠，设立为期三年的中国研究讲席，由周祥光任职。1951—1954年周祥光在德里大学历史系任中国历史课程讲师，将课堂讲义汇编成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史》出版^⑥，同时出版

① 周祥光：《出仕印度政府》，《校友通讯（南京）》1946年第6期，第38页。

② 参见“周祥光居士等来书”，《海潮音》1947年第28卷第3期，第36—37页。

③ 〔印度〕尼赫鲁：《中国与印度》（上）（中）（下），周祥光译《申报》，1946年12月11、12、13日，第0004版。

④ 〔印度〕尼赫鲁：《尼赫鲁给女儿的信》，周祥光、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⑤ 参见周祥光《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旁听记》，《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30日，第0005版；《印政府改组经过》（上）（中）（下），《申报》1946年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1日，第0004版；《分娩中的印回现势》，《申报》1947年7月8日，第0007版；《印回分治：印度政局在演进中 英国退出印度前夕》，《申报》1947年5月18日，第0007版。

⑥ Chou Hsiang-kuang,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Delhi: Metropolitan Book Co, 1952).

《印度政党》《新生的印度》《印度独立之人物及其思想背景》等中文著作^①。

1955年4月14日周祥光凭借英文著作《中国佛学史大纲》(*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获得德里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印度建国以来首位中国博士。^②该著由印度贝纳勒斯大学(Banaras University)兼安纳马莱(Annamalai University)大学校长罗摩斯瓦米爵士(Sir C. P. Ramaswami Aiyar)和台湾国立政治学院院长张君勱作序^③,1956年此书再版时西孟加拉立法委员会主席S. K. 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博士作序^④,该书后成为周祥光的代表作。

1953—1954年德里大学任职求学之余,周祥光也在德里的印度政府中央行政人员训练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Training School)任中国现代历史课程教师,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史,讲义后与德里大学授课教义汇编入英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⑤和《中国文化史:从早期至二十世纪》^⑥两书中。

1954年秋,周祥光赴阿拉哈巴大学(University of Allahabad)任中文系教授。创办于1880年的阿拉哈巴大学是当时北印度最大的大学,从1948年起开设学制两年的中文系,但学生很少,成绩也平平。周祥光接任中文系教授后积极整顿,增加新闻阅读等课程,并用录音机协助施教,成绩斐然,至1957年学生已达三十余人。^⑦

① 参见周祥光《印度政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新生的印度》,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印度独立之人物及其思想背景》,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

② 详见《海潮音》1955年第36卷第6期,封底。

③ Chou Hsiang-ku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Allahabad: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1955), pp.1-7.

④ Ibid., pp.4-8.

⑤ Chou Hsiang-kuang, *Political Thought of China* (Delhi:S.Chand&Co.,1954).

⑥ Chou Hsiang-kua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D* (Allahabad: Central Book Depot, 1958).

⑦ 吴秀云:《印度各大学研究中国历史与语文概况》,《自由中国》1957年第17卷第10期,第30页。

1956年，周祥光著30万言《印度通史》在新加坡出版。^①他英译融熙法师著《无相颂讲话》《佛教与禅宗》也由印度中印文学出版社印行。^②同年，为纪念佛陀二五〇〇年诞辰，印度国家史学会计划编印由各国佛教学者执笔的150万余言《佛学论集》丛书，周祥光受邀撰述《中国禅宗发展史》，于四年后的1960年出版。^③1956—1958年，他在《海潮音》发表了《薄伽梵经研究》（一~五）^④和《阿育王及其实训》（一~五）^⑤，后分别于1958和1983年出版^⑥。

1959年受国际时局影响，周祥光于1952年所著英文《中国现代史》一书中使用的中华民国地图遭到印度内政部审查。^⑦审查历时数月，最终判定以撤掉地图页为终。迄今《中国现代史》湮而难寻，英文著作《中国文化史》末页所附中华民国地图^⑧在后续版本中未予以保留。

1963年夏季，周祥光因胃溃疡急疾在印度不治而逝，年逾不惑而已。其时，他正在修订即将出版的《印度哲学史》第三卷。这部中文遗著为其经年学道、授业、禅修的集中体现，其吠檀多学立场使其著作成为继梁漱溟、汤用彤之后，又一部彰显哲人主张、倍显价值的中国印度哲学通论性学术佳作。但由于他溘然离世，该著仅存第一、二

① 周祥光：《印度通史》，新加坡：友联书局，1956年。首版书名由行简题署，张君动作序。此著后分别于1957年和1981年在香港自由出版社和台北大乘精舍印经会出版。

② Yung-Hsi, *The Commentary on "Formless Gatha": Buddhism and The Chan School of China*, trans. Chou Hsiang-kuang (Allahabad: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 1956). 后由香港佛经流通处收入《佛祖音容》第四册，2000年。

③ 详见《海潮音》1956年第37卷第4期，封底。

④ 详见《海潮音》1956年第11期，第3—4页；1956年第12期，第6—7页；1957年第1期，第10—11页；1957年第2期，第11—12页；1957年第4期，第15—19页。

⑤ 详见《海潮音》1957年第10期，第13—16页；1957年第11期，第10—11页；1957年第12期，第20—21页；1958年第39卷第1期，第16—17页；1958年第2期，第18页。

⑥ 参见周祥光《薄伽梵经研究》，2，香港：印度华侨青年联合会，1958年。

⑦ 详情见印度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卷宗编号22/118/59-Pol.I号文件。

⑧ Chou Hsiang-kua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 D.* (Allahabad: Central Book Depot, 1958), p.194.

卷^①，实为学林之憾。

噩耗传来，中印学界无不痛心疾首。张君劢撰《悼印度亚拉哈巴大学教授周祥光君》一文深切悼念。文曰：“天地之间，人才不易得，不易养成，尤不易有成就。呜呼！祥光！抗战之中，经艰难辛苦以求学于印度，刻苦自励，半工半读，以求自给，卒毕业于德里大学……孰料此时正为君发展长才之日，奈忽因胃溃疡而溘然长逝。呜呼！今后欲求二十年留印，而能负起中印学术外交之使命如君者，何可再得乎？我与君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原不敢自居为孔子与阳明，然君之造诣，确能追踪颜回与徐爱，既有天资之美，而不许其永年，能不令人痛哭流涕哉。”^②

二、鸿儒相交：与印度贤达交往

周祥光身兼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数职，在中、印等多所名校求学与任教，与印度政要、知名学者及国际学者交往频密。他谦逊好学，躬身践行，体察民情，足迹遍布印度各地，在印度侨胞、僧尼各界有较高的声望。

早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期间，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就对周祥光学识“钦敬无已”^③。1950年代谭云山、周祥光共同为中国僧尼筹募在印建佛寺而奔走。^④印度汉学家郭克雷（V. V. Ghukla），曾与印度汉学家师觉月（P. C. Bagchi）同在法京巴黎大学学习中文，后在中国学院任教一年，常与周祥光探讨佛道两教理论问题。^⑤郭克雷后任教于孟买

① 周祥光：《印度哲学史》（一）（二），台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3、1964年。此书纳入“台湾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七辑。另有国防研究院印行版本。

② 张君劢：《悼印度亚拉哈巴大学教授周祥光君》，《狮子吼》1963年第9卷第3、4期合刊，第32页。

③ 参见郭波陀耶论师《序》，〔印度〕杜耶难陀：《真理之光》，周祥光译，香港：印度雅利安学会隐者羽士国际联盟会，1957年。

④ 详见《海潮音》1956年第1期，封底。

⑤ 周祥光：《孟买半月间》（下），《中央日报》1947年12月6日第0007版。

的福开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1947年秋周祥光在孟买小住半月时，与老友郭克雷、金克木相见，相谈甚欢。周祥光评价金克木道：“金君对于梵文有相当造诣，去冬来此，研究梵文，承彼招待饱餐一顿。金君现已返国，就任武汉大学印度哲学教授。”^①

周祥光在求学、教书与履职之余，不间断地游历各邦，拜谒贤哲。1945年，受谭云山好友梅屈拉教授（S. K. Mitra）^②引荐，周祥光前往阿罗频多学苑（Sri Aurobindo Ashram）拜访印度当代圣哲阿罗频多。此时阿罗频多已隐退数十年，每年仅有四次面圣（darśana）^③机会，虽已七十四岁高龄，然仍“鹤发童颜，道貌岸然，望之令人肃然起敬”^④。他详述4月24日亲见圣哲之景象：

斯时阿氏与圣母共坐于一室，阿氏居右，圣母居左。吾辈各持鲜花一束供献，余向二老顶花时不觉精神充实，杂念俱消。阿氏衣白色，印度常服二臂袒露，头发现金黄色，精神矍铄，道貌岸然，身体魁梧健壮；圣母则衣印度沙丽。二老见余至，俱微笑相答，此一刹那，即余与阿罗频多氏婚缘所自。事后圣母曾询阿氏曰：汝见中国青年周君来此访问乎？阿氏回，余知之见之矣，此人具道器，对于生命神圣事业，当有作为，印人闻之，益为敬慕。^⑤

周祥光在阿罗频多学苑停留半月有余，每日看书之余，与阿氏诸弟子探讨生命哲学，尝试与中国思想会通。他说：“余并先以吾国宋明

① 周祥光：《孟买半月间》（下），《中央日报》1947年12月6日第0007版。

② 梅屈拉教授是贝拿勒斯印度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主任，阿罗频多学会（Sri Aurobindo Circle）主席，1939年11月曾陪同谭云山先生拜谒阿罗频多。参见朱璇《谭云山对室利奥罗宾多思想的译释》，谭中、郁龙余主编《谭云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③ 印度教徒觐见神明、圣人和尊者，表达敬仰和信爱的一种方式。

④ 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7期，第6页。

⑤ 同上书，第6—7页。

理学问题，阐明印度哲学能与瑜伽证相合，先明真理，而通常理，中国哲学则从事理中去体验真理，方法虽属有异，究竟目的则同，佛言宇宙真理祇一，众生所见不同耳。”^①他逐渐认识到：“阿氏所创生命神圣学说，为现代唯心学派中之一大学派，印人视为二千年前大圣人之再生，印度文艺复兴之灵魂……今后吾人要促进中印学术文化与夫两国民族情谊，对于印度立国精神，不可不加以研摩，阿罗宾多氏之哲学，可谓代表此一趋向。今后吾人要为未来世界和平奠一基石，则对阿氏哲学，尤须致力焉。”^②

5月5日，周祥光离开学苑。辞别前，他向苑母告述自己投身于生命神圣事业之志愿，蒙苑母一一指示许可，这或许是他后来立志研学佛学和印度哲学，以求内证互参的机缘。值得注意的是，周祥光曾在1946年5月8日写给太虚法师信中提及，当年下旬他将赴阿罗频多学苑执教中文^③，后是否成行还需进一步询证。

5月7日周祥光参访金奈的马德拉斯大学（Madras University），发现其图书馆“印度哲学书籍，即有十余万卷，惟有关于吾国哲学者，则只有一本老子道德经（英译本）”^④，甚为遗憾。8日晨抵达泰米尔邦蒂鲁瓦纳马莱（Tiruvanmalai），拜谒拉摩禅师，他详述已与禅师同坐一室四日情形：

余等承路博士盛意，向以早餐，并沐浴更衣，余乃与古教授，手捧水果鲜花，至拉摩禅师修道院谒见，余进入禅师大室时，古教授特予介绍，此系中国周君，特来奉访：禅师点头示意，余等即席地而坐，禅师则斜躺于床中，斯时，余之心中，襟念俱消，惟有一片虔诚，趋向哲人耳。拉摩禅师今年六十五岁矣，头发全

① 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7期，第7页。

② 周祥光：《印度圣哲阿罗宾多访问记》，《觉群周报》1947年第25期，第13—14页。

③ 《周祥光居士来书》，《海潮音》1946年第27卷第8期，第34页。

④ 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7期，第7页。

白，身下仅穿一条短裤，出外时，手携一杖，及一泥壶而已；慈祥恺悌，溢于面上。中午十二时，余等静坐毕，即与禅师同至餐厅就餐，禅师坐于中间，余等分坐两边，此间食物，完全塔米尔习俗，小菜约八九样，甜、酸、苦、辣俱有，该修道院司事，恐余不能就食，特另备水果，牛奶与之。

余在铁城，先后五日，与禅师同坐一室，则达四日之久，自晨至晚，未尝他离，余每欲言而不敢多言，惟彼此心心相印，精神上益觉贴近。^①

5月19日周祥光回到加尔各答，在参访圣哲后，他对“安心立命之学益具信心，服务人类之愿更形坚定”，“使余在生命之征程上，添了光辉而可足纪念之一页！”^②他在为中华学校全校师生作报告时不无动情讲述：“余返加后，曾对各华校师生联合会上说明游访经过，并作结论曰：（一）民族之盛衰，须视能否保持其民族文化为转移。（二）成圣成佛，自有其道，要视吾人发愿心，始能得之。（三）阿罗频多及拉摩禅师二人，已示吾人归真之路，吾等如遵循之，能达彼岸。”^③

1945年冬周祥光辞去中华学校校长之职，开始印度圣地之旅。他于当年12月26日从加尔各答出发至比哈尔邦巴特那（Patna），后搭车和火车参观王舍城、灵鹫山和那烂陀大学，1946年2—3月游至阿旃陀石窟、桑奇大塔和阿格拉。他在给太虚法师信中曾详述自己游学历程：

光于去年十二月间，辞去此间华文印度日报编辑主任及中华学校校长二职，乃即漫游印度佛教，婆罗门教，回教，及锡克教等圣地，历孟加拉、比哈、孟买、联合省、旁遮普、中央省，及

① 周祥光：《天竺拉摩禅师参访记》，《海潮音》1947年第3期，第28页。

② 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7期，第8页。

③ 周祥光：《天竺拉摩禅师参访记》，《海潮音》1947年第3期，第27页。

阿及梅尔等七省，与海特拉巴，蒲浦及古立河，界坡四大土邦，计程六千多英里，费时三月，所得颇多，胸怀为之一放。^①

游历之余，他将参访经历一一记录，发表《天竺访圣记》《印度圣哲阿罗宾多访问记》《天竺拉摩禅师参访记》《灵鹫山前王舍城》《住馨溪、考佛迹》《访印度蒙古儿王朝故都》^②等诸文，约十万字，同时开始译述《印度通史》一书，计划以每日三四千字速度进行，约三个月完成。

1946年1月，周祥光赴喜马拉雅山德立洞（Dehra Dun），晤阿难梅耶圣母（Sri Ma Anandamayee），并乘坐火车，陪伴圣母到恒河发源地呼陀河，期间他请教宗教哲学及瑜伽种种问题，皆得圣母不厌其烦详确答复。周祥光写道：“经她这一答解，我始恍然知道，不论任何宗教，其教义虽略有不同，而其证量必完全相同，盖皆自‘纯心’（Purification of Mind）上下功夫，佛家如此，婆罗门如此，回教如此，道教亦如此，所谓‘塞见垂帘默默窥，满空白雪乱参差。殷勤收拾毋令失，伫看孤轮月上时’。”^③

同月，周祥光寄望了解印度宗教文化之所在，经印度史学家葛笃教授引荐，至呼陀河乡间参观由著名社会改革家杜耶难陀（Dayānanda Saraswati）^④的弟子创办的民族文化大学，参访四日令他印象深刻，著文《印度民族文化大学游访记》^⑤，称印人复兴印度教，保留民族文化精

① 参见“周祥光居士来书”，《海潮音》1946年第8期，第34页。

② 周祥光：《天竺访圣记》，《旅行杂志》1945年第7期，第8页；《印度圣哲阿罗宾多访问记》，《觉群周报》1947年第25期，第12—13页；《天竺拉摩禅师参访记》，《海潮音》1947年第28卷第3期，第27—29页；《灵鹫山前王舍城》，《旅行杂志》1946年第20卷第4期，第45—46页；《住馨溪、考佛迹》，《海潮音》1947年第4期，第24—26页；《访印度蒙古儿王朝故都》，《旅行杂志》1947年第21卷第4期，第63—65页。

③ 周祥光：《妙高峰下一圣母》，《海潮音》1959年第40卷第10期，第17—18页。

④ 杜耶难陀是雅利安社（Arya Samaj）创始人，印民族主义和吠陀文化复兴运动代表人物，其于1875年用印地语撰述《真理之光》，销量15万册，为数百万印人朝夕诵读之书，在印度影响深远。

⑤ 载周祥光《印度独立之人物及其思想背景》，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第26—28页。

髓的举动，乃最强复国运动。这次参访促使他于1957年将杜耶难陀生前影响力巨大的代表作《真理之光》(Satyārth Prakāś) 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对国人了解印度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之精髓，功莫大焉。

周祥光与圣雄甘地共会面三次。早于1944年，周祥光曾在加尔各答苏地铺修道院见过甘地。1947年春，周祥光在新德里两次与甘地会面。每次谈话间，甘地总要他到乡间去，只有到那里才可以知道人民真实苦痛情形，“假使你住在新德里，是看不见真实的印度的”^①。

同年秋印巴分治动乱中，甘地到新德里英王路难民营作祷告。与民众同在路边的周祥光、苏吉多女士见甘地在路旁下车后，赶紧搀扶他走上祈祷台。11月5日下午三点半，周祥光赴比拉公馆拜谒甘地，这是他与甘地的最后一次会晤：

我一眼看见这位老人的时候，口中很自然的喊出声：“爸爸，那摩斯伽！”他老人家也回答着：“周，那摩斯伽。”他用手向我招呼，要我坐在他的面前。旁边还有几个印度人，手摇着纺车，做他们织布的工作。他先向我说：“我看见你来的时候，好像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他虽然身体健壮，但终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讲话的声音很低，须得聚精会神的去听。他继续地说：“中国人，在我并不陌生，好像有姻缘连系着。我从前在南非的时候，同好多中国人住在一起，并且，我在那时实行不抵抗运动，还与好多的中国人一起关在牢狱里。”我即时对他说：“你的一生也够苦了，不知道进了多少次监狱，你将监狱当作家庭了。这是你把人类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所以，你走入牢狱不以为苦。怪不得诗人泰戈尔尊你为摩诃多摩（圣人之意），他曾经说你将世人之苦乐作自己之苦乐。这一点，也和我们中国儒家所说，一夫不获其所，若已推而纳诸沟中，一样”。“太客气了”他

① 周祥光：《我与甘地的最后一次会晤》，《印度独立之人物及其思想背景》，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第107页。

笑嘻嘻地答着。^①

周祥光后又向甘地求教印度教神祇是否存在，业律若为道德律，是否陷入定命论等问题，甘地说，神名只是智者开导众人之词，实际上帝就是真实，也是自己最后“实在”的显现。做好事则不应抱着定有报酬的主张，要做公而忘私的事业。最后，周祥光和甘地约定来年二月去真理书院跟随甘地学习，并请甘地在其照片后面签名，按常规甘地签字要收取五盾卢比，捐助到他所建的贱民协会中去。

1951年，周祥光受印度教育部之令，赴加尔各答帝国图书馆摘译二十四史和四库珍本，与印度前总督兼德里大学校长罗迦古波迦黎氏（C. Rajagopalachari）首次会晤。罗氏年届八旬，不仅是印度政治上首脑人物，曾与甘地共同致力于印度独立运动，也是著名哲学家，有“南印甘地”之称。此次二人会晤，罗氏向周祥光赠送其近影一幅。当周祥光在德里大学就学与任教后，将罗氏代表作《吠檀多哲学：印度基本文化》（*Vedanta: The Basic Culture of India*）译成中文出版^②，弥补国内吠檀多学研究空白。

西欧东方学权威，曾在国际大学讲学三载的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兼中东远东研究所所长杜琦博士曾是周祥光博士论文审查人之一。自1950年代起周祥光与杜琦两人函札往返已久，直至1952年杜琦应尼泊尔政府之邀，参加新德里塔米尔文学会之时，才与周祥光面识。此后杜氏每次抵印，必与周祥光“相约晤叙，风仪师友，快慰平生”^③。

周祥光因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事，又翻译尼赫鲁著作，颇受尼赫鲁青睐，多次被尼赫鲁推荐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56年11月，尼赫鲁推荐他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佛教对于艺术、文学与哲学之贡献讲习

① 周祥光：《我与甘地的最后一次会晤》，《印度独立之人物及其思想背景》，第108页。

② 〔印度〕罗迦古波迦黎：《吠檀多哲学》，周祥光译，印度加城中华学校发行，香港：印度华侨青年联合会，1958年。

③ 周祥光：《当代西欧东方学权威——杜琦博士》，《海潮音》1955年第3期，第23页。

会议”，与英国罗素博士、法国居里博士、日本中村元博士等亚欧著名学者及锡兰、缅甸、泰国国王或内阁总理等共同讲习一周。^①

周祥光重视学研与实修。1953年他赴北印度仙坡（Rishikesh）参加世界宗教大会（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结识传奇圣人斯瓦难陀（Swami Sivananda Maharaj）。1957年撰述英文著作《斯瓦难陀：善人还是圣人？》记录他与师尊的交往。^②1959年更是在斯瓦难陀导师引领下，自学禅修渐入佳境，他说：“我于1959年8月3日午夜瞥见精神世界。在此之后，我觉得能够理解佛经的真正含义了。而且，我坚定相信，世界和开悟者是一体的。在无穷数学中没有余数。所有生命皆为一，所有生命皆为禅那真理之彰显。简言之，生命是所有万物基础，除它之外，别无所待。”^③

印度副总统、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既是周祥光的引路人，也是他的精神导师。作为印度副总统兼德里大学校长，拉达克里希南曾主持周祥光的博士毕业典礼，邀请周祥光参加1957年第十九届全印东方学者会议，更为周祥光英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和中文著作《印度哲学史》作序。他为《中国政治思想》作序言曰：“今天，我们对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非常感兴趣，这本书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是很有价值的。”^④

周祥光深受拉达克里希南比较哲学研究视野影响，其在《印度哲学史》中因袭拉达克里希南在《印度哲学》（*India Philosophy*）中对印度文明“精神性”的解读，指出此“精神”者，与物质并举，非心灵或灵魂之说，而是至高真理降至人心状态，是为无形真理。“精神云者，乃人类尊严之所在，亦即自由之张本也。精神云者，乃智情意三者未分以前之状态。此中之自觉性，乃自为一体而不可分析者。当精

① 参见《海潮音》1956年第11期，封底。

② Chou Hsiang-kuang: *Sivananda: Good Man or God-man* (Rishikesh: Divine Life Society, 1957).

③ Chou Hsiang-kuang: *Dhyana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Teaching* (Allahabad: 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by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1960), p.v.

④ Chou Hsiang-kuang, *Political Thought of China* (Delhi: S.Chand&Co., 1954), Foreword.

神发动之际，亦即心灵自成为一体之际，而人与永恒或神合一，乃在人之直接证悟中矣。”^①周祥光承继自印度主流哲学吠檀多学立场，梳理印度哲学发展史，亦受到拉达克里希南思想的影响。

三、结语

周祥光旅印20年横跨政界与学界，从仕途走向讲坛，既与他个人志向与追求有关，又受到印度贤达的影响。他与印度知名学者、思想家、圣哲基于敬慕与尊重的交往，使他贴近“印度之心”，成为渴慕并躬身践行“精神性”的寻道之人。他的英文述作极大拓宽印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由英文译成印地语的《中国佛学史大纲》流传广被，影响印人至今。

周祥光惜时如金，勤勉不已，在旅印期间出版20余部中英文著作，80余篇中英文文章，翻译与著述贯穿生命始终。他的中文著作以介绍、阐述印度历史、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哲人思想为主；英文著作则以介绍、译介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佛教为主，所涉范围从政治、历史、人文至文化、宗教、哲学，范围之广，运思之深，没有巨大的精力、心力和毅力的投入，难以为继。从论著广度与深度来看，周祥光不失为近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印度学家。

在1940年至1960年的动荡年代，周祥光对中印学术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值得后学纪念与研究。他在翻译《阿育王及其石训》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温仍在，念及阿育王仁民爱物、公正和平之政策对邻国与后世的影响，他曾说“虽然今日世界离阿育王之理想——大家和平相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亲爱的社会尚远，但我人却向此目标前进”^②，此语在当下仍不乏启示与鼓舞之意。

① 周祥光：《印度哲学史》（一），台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3年，第11页。

② 周祥光述译：《阿育王及其石训》，第17—18页。